

论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中的计划 经济与市场调节

许 经 勇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完善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科学管理，是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两三年来，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步伐，党中央又在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协调起来，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进行探讨与研究。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四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我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本文拟就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如何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

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中，既要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所处的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归根到底，是由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产生并发生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所决定的。具体地说，从一方面看，只有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客观要求，合理地安排农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以及农业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比例失调，达到紧密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全面高涨，更好地满足建设城乡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多方面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农业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联结成为有机的统一整体，它们的经营活动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为有计划地调节各方面之间的比例关系，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给我们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固有的基

本特征。人们有可能通过统一计划自觉地安排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求得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同时,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如果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那么,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农村的主体经济形式,是组织规模不等、经营方式不同的集体经济。为了坚持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全国各地不论实行哪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不允许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对于哪些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应当通过各种承包合同关系,把作业组、农户、专业人同集体、国家联系起来,妥善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极少数地方出现的分田单干,化公为私,应当积极进行疏导工作,从扶持发展生产,增加集体经济因素入手,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逐步组织起来,朝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方向前进。

但是,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农业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从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来看。

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部门和单位,要同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经济联系,都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从事实上承认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各自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而一旦社会经济中还存在着商品关系,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生作用。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农业生产能够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家在制定计划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下,如果不借助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是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地说,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是分散在数量众多的农业企业中进行的,各类农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由许许多多农业企业与非农业企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还原而来的,而这些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平均消耗量又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是很难进行精确的计算和预测的;由于我国农产品种类极其繁多,不同农产品的生产条件与销售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其专业化与社会化程度很低,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农产品都实行直接的、包罗万象的计划管理;此外,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之间以及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不合理比价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得到解决。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如果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就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的需要,农产品的产、供、销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产品供求关系是否协调,产品价格是否合理,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及时发现,也只有借助于市场机制才能妥善解决。这就要求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必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还决定了每一个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完全意义上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各个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向国家缴纳税收以后,集体能够积累多少,社员能够收入多少,都直接取决于该农业企业收入的多少。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基于

上述原因,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在安排农业生产时,除了首先考虑国家计划的要求,还必然会比较农产品价格的高低,权衡所得物质利益的大小。如果我们完全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注意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无条件要求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规定的要求进行,不允许有任何机动性与灵活性,就不利于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顺利地实行。

其次,从农业再生产的特点来看。

农业部门是直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部门。我国目前大部分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又是以农户作为承包单位的。因而,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是合为一体的。农业经营的基本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为了直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这就决定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还必然带有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特点。由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及其所属的承包单位)所生产的农产品,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用于该经营单位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这是造成我国目前农产品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应当指出,各个农业经营单位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中,自给性部分与商品性部分,并不是从产品的使用价值上可以截然分开的,也不是从产品的数量上可以固定不变的。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必然会相应提高。即使在农产品总生产量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发生变化,也可以在一定幅度内使自给性部分转化为商品性部分,或者使商品性部分转化为自给性部分。从上述实际情况出发,不论是为了调动农民群众增加生产的积极性,或者是为了鼓励农民群众把更多的农产品投入到市场,都需要我们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给农民群众以见得到的物质利益。还应指出,由于自给性生产是直接满足该经营单位的农业再生产和农民群众生活的需要,是发展商品性生产的前提条件,而商品性生产是满足社会其他部门对农产品的需要,具有直接的国民经济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处理这两部分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果自给性部分不适当地扩大,就不可能保证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商品性部分不适当地扩大,就会影响农业再生产和农民群众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两者之间的最优比例,单纯依靠预先确定的计划指标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依靠经济政策,灵活运用价格、信贷、奖售、合同等经济杠杆,乃至适当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才有可能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把客观需要与实际可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其生长发育都有其特殊的生物学规律,受土地、气候、水、生物等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兼有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的特点。在不同的农业生产周期,乃至同一农业生产周期的不同生产阶段,由于人们还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然条件是变幻无常的,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温差很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分散性。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国家对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都一律采取直接的、指令性的

计划指标,统得过多,限得过死,就不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也不利于国家计划的完成。由此可见,哪种把国家的计划性和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必要的灵活性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计划性,就不允许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安排生产活动上有任何灵活性,都是对农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而一旦给予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安排生产活动方面有较多的灵活性,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使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农业再生产也就活跃起来了。

综上所述,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既要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要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所处的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二)

长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的人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使用价值);既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物,价值规律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换一句话说,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不能有市场调节;要发挥市场调节,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价值规律是在几个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商品关系,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发生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商品关系中起作用的经济规律,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规律,还有其他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不可能孤立地发挥它的作用的。因此,要说明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特点,就必须把它同其他同时起作用的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考察。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基本点,就在于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中,价值规律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由它所支配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同时发生作用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认识价值规律作用的特点,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商品经济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因而,作为商品经济关系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即价值规律,一向是作为一个从属性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由它所支配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不应当是价值规律。如果我们不严格分清它们之间的主辅关系,过份夸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不可能因势利导地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防止它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有被损害的危险。最近一段期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产品的计划管理

受到冲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挤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正是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的。当然,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因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交换双方的物质利益,因而明显地引起商品生产量与销售量的变化。在农业集体经济中,任何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及其所属的承包单位),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自然而然会考虑生产资源与最终产品之间的价格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根据,来决定生产资源的施用量、产品的生产量以及产品销售量。如果我们不注意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顺利地实行。换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由它所支配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直接反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整体要求和全局利益。如果否认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本位主义和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社会主义再生产就不可能持续地高速度地进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就无法得到应有的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有被瓦解的可能;与此同时,之所以必须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国家计划要求互相衔接起来,更好地反映经常变化的市场需要,确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顺利实行。

还应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自觉地、经常地保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这一方面为在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基础上制定农产品价格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农产品价格的客观要求。诚然,在农业集体经济中,有一部分农产品的生产量与交售量是由国家有计划规定的,其产品价格也是由国家有计划制定的。但是,为了保证这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换能够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进行,国家在有计划制定与调整农产品价格时,乃必须尽可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为基础,才能使大多数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出售农产品所获得的收入,不仅能够补偿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而且还能够取得大致均等、合理的利润。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经济法则,把这部分农产品价格定得过低,致使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不仅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有困难,就会挫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到头来,又将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有计划地提高这部分农产品价格,方能增强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逐步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此外,在农业集体经济中,还有一部分农产品价格,并不是事先由国家计划制定的,主要是根据产品供求关系及其销售条件形成的。这就要求国家必须灵活地根据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允许农产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浮动,以刺激或抑制这部分农产品的生产量与销售量的,并通过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实行议购议销的办法,来平衡这部分农产品的供求关系,调节这部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妥善解决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调节农产品生产与交换的是供求关系与市场价格,市场调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控制和许可范围内,被国家自觉地利用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辅助的关系。国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且要研究市场供求的变化,乃至因势利导地运用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物质供应政策等,来有计划地指导各种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使之尽可能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为了完善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以便自觉地调整与协调各方面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指导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片面强调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的承包单位)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片面强调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不积极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它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直接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就无法避免农产品生产与交换的局限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就不可能妥善解决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市场物价也难以稳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不能因为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强制要求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统通由国家具体规定,取消了它们必要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否认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就必然会使农产品生产与交换陷入僵死的状态,农产品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这就决定了我们现在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农业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市场机制与价格机能,如实反映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逐步调整和完善国家计划,使国家计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才能透过市场机制与价格机能,刺激或抑制农产品的生产量与销售,实现国家计划所要求的供求之间的相对平衡;才能通过市场机制与价格机能,促进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的承包单位),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力争超额完成国家经济计划,从而,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严格按照社会需要来组织和开展农业生产。

(三)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主要表现在:为了切实有效地实行国家对农产品生产与交换的计划领导,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疏通流通渠道,调节供求关系,国家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计划收购政策,从而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交换采取国家计划收购的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

(1)有利于把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所属承包单位)的经营活动,直接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减少盲目性和自发性;(2)可以使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更好地满足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3)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调节农产品供求和农产品价格,保持市场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兼顾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4)有利于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所以,无论是现

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能轻易否认国家对农产品交换实行计划收购的必要性。否则，必然给国计民生带来有害的影响。在我国当前许多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们更当慎重对待这个问题。

为了全面认识我国对农产品交换实行计划收购的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对我国农产品的国家计划收购制度的形式与发展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建国初期，即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其中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将近90%，私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占了85%，与这种条件相适应，我国实行了在国家统一经济计划内的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农产品在市场上是自由购销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办法，是在自由市场上，根据国家规定的牌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在这一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实行国家统一经济计划内的贸易自由政策，只要国家规定了正确的价格政策，个体农民根据市场价格的情况，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有可能大体上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例如，在当时，为了鼓励农民群众生产更多的经济作物，以满足发展轻工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国家及时地调整了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比价，这对适当调整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加快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速度，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3年以后，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人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国民经济中非农业部门发展很快，粮食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富裕农民争先出售副产品，而把粮食积存起来，待价而沽。富农和投机商又利用粮食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采购的机会，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追逐暴利。面对这种情况，要么听任富农投机商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破坏国计民生；要么把采购余粮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理所当然果断采取后一种办法。从1953年开始，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即统购统销政策。

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办法，又有了新的发展。直到现在，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是将农产品分为一、二、三类，并分别实行统购、派购、议购等形式。具体地说，除了对上述关系国计民生特别重大的农产品，即第一类农产品（如粮、棉、油）实行统购，对关系国计民生比较大的农产品（如麻、丝、糖料、茶叶、生猪、羊毛、烤烟、中草药以及集中产区的水果等），则实行派购。根据以前的做法，统购与派购的主要区别，在于统购的产品，其生产任务与交售任务，都有比较严格规定，并带有相当程度的指令性；而派购，一般是不直接下达生产任务的，或者虽下达生产任务，但不作硬性规定。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定购合同纳入国家计划的。此外，统购的任务一般只下达到各县的基层收购部门，而派购的任务，则是直接下达到生产单位。除了第一类和第二类农产品，其余均属于第三类农产品。这类农产品一般不是属于基本生活资料，大多是零星分散的小宗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总产值不大，但品种繁多、生产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大，因而，对于这类农产品，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它们的生产与分配实行计划管理。基于上述特点，它和第一、二类农产品不同，国家既不规定收购任务，也不规定销售价格。国家

可以根据需要,与生产单位签订订购合同,或者直接在农贸市场上市议价收购这类农产品。通过上述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类农产品也适当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我们认为,建国三十多年来,国家在对农产品生产与交换实行计划管理过程中,尽管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说,还是能够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既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一)为了有计划地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保证国家计划的顺利完成,在对农产品下达指令性和非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还注意按照各类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情况来规定和调整这些产品的计划价格。

具体地说,为了鼓励农民群众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加农产品商品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国家在有计划制定与调整农产品价格时,尽可能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积极而又慎重地逐步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例如,1952年同1950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9.7%,工农产品交换差价缩小9.7%;1962年同1952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61.9%,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14.7%,工农产品交换差价缩小29.2%;1962年至1978年的16年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干扰破坏,国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调整工农产品价格差价,因而农产品价格只提高7.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12.8%,工农产品交换差价缩小18.9%。1978年同1950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07.3%,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9.8%,工农产品交换差价缩小47%。1979年,国家又下决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1979年同1950年相比,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65.5%,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9.9%,这就使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了较大的缩小。由于国家在有计划收购农产品方面,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杠杆的辅助作用,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水平,这就有利于调动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逐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二)对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以后超购的那部分农产品,实行加价奖励政策,对某些重要经济作物产品和其他派购农副产品的计划收购,实行各种奖售政策。

加价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农民群众增加生产量与交售量。实践经验表明,当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到一定水平,要进一步增产每一单位的农产品,势必需要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肥料、农药、机械、人力等,同时,由于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有些农用工业品的零售价格还一时降不下来,因而,单位农产品成本将会伴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而提高。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合理补偿生产者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追加的活劳动耗费与物质耗费,保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在对粮食、油料实行定征购(先是一定三年,后改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对超征购基数而增购的那部分农产品,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又明确指出,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的收购价格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

奖售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农民群众努力增加生产量与交售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近几年来,我国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还实行了诸如棉粮挂

钩、糖粮挂钩等各种奖售政策，使得棉花、糖料、油料、烤烟等经济作物大大超过了国家计划。

（三）对实行派购的二类农副产品，确定合理的收购基数，一定几年；某些不便确定基数的品种，也要确定合理的购留比例。超过基数以外的产品，有些仍由国家收购，有些按比例收购一部分，有些全部由社队和农民自行处理和自由出售。同时，超过基数以外的那部分产品的收购价格，允许按照市场供求情况，实行一定范围的浮动，即采取议价收购的形式。实行议价收购的那部分农产品，出售价格是由国家收购部门和生产者买卖双方根据产销情况决定的，国家可以根据价格高低和供求情况，有计划确定其收购数量。一般说来，在价格低的地区，可以多收购；在价格高的地区，可以少收购或者不收购。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计划地调剂地区之间的余缺，平抑市场物价，满足消费者的要求。诚然，在目前农产品普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议价收购的农副产品价格，一般都会高于国家计划收购价格，但是，由于实行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的议价收购，更有利于促进生产，调节供求，因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议购价格与计划价格的水平，必将日益接近。

（四）对第三类农副产品，国家一般不直接下达计划指标，或者仅下达某些指导性的间接计划指标，生产单位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即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供需情况，自己组织生产与销售。不用说，这部分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所支配的。但是，这样做，有利于使农村经济更快地活跃起来，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城乡消费者的需要，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上面说的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方面的主要措施，但是，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主要问题是，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党中央针对当时农产品收购中出现的某些缺点，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地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用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在一些部门和地区或某些农副产品收购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大注意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不大注意照顾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大注意与农民群众平等协商，没有认真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原则，没有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合同制度，没有形成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计划管理统得过死，计划指标定得过高，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妨碍了产、供、销的协调发展。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为了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从农村收购农副产品，必须以质论价，禁止压级压价。粮、棉、油等统购物资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和议购都应该签订合同，遵守合同。不准强迫命令。”合同制是一种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经济上的契约，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和履行经济任务的书面决定。合同制的主要内容，一般应包括生产单位交售农产品的品种、数量、规格、时间、地点、包装条件；以及收购部门应付的收购价格、付款日期和在物资供应、技术指导等方面所负的责任，同时，还应当明确规定双方

违反合同的赔偿办法。经济合同，应当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无论哪一方面，不履行经济合同，都要承担经济责任。有关政法部门，要受理这类案件。在目前实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下，为了确保生产队同国家之间经济合同的兑现，首先要求生产队必须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把生产队与农户、作业组、专业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合同形式确定下来，把承包单位（农户、作业组、专业人）的主要经营活动直接间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制度上保证全面完成经济合同所规定的统购、派购、议购等指标。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合同制是一种主要依靠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好形式。它有利于把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和尊重生产单位自主权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因地制宜地指导农业生产，把产、供、销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农业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计划是经济合同的基础，经济合同是国家计划的实现形式。因此，今后我们应当把建立和健全经济合同制，作为协调国家计划与农业集体经济单位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这种经济联系形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又发挥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它是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当前，必须着重指出，由于我国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仍然存在，由于各种农产品价格的比价、特别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价还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再加上我国农产品交换还存在着多条流通渠道、多种价格体系的情况，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实行，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和指导性计划指标来管理农业集体经济是不够的。要把单一的指令性计划逐步改变为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要使经济合同制能够逐步地推广、落实，除了必须进一步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结构，完善农产品的收购制度，乃至辅以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即该统还是要统）以外，还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伟大教导，切实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无政府现象的发生，从思想上、制度上保证按质按量完成经济合同所规定的各项计划收购指标。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我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认识。